

doi. 10. 3724/1005-0566. 20260810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作用： 揭示要素双向流动与产业智能化转型的中介效应

邱国良^{1,2}, 莫梓淇¹

(1.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6;

2.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基地, 湖南 长沙 410015)

摘要:选取中国在2010—2023年1 17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深度探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可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表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通过要素双向流动与产业智能化转型促进共同富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中部地区、低财政压力地区及高创业活跃度地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强化业态增值和农业产业链条延伸支点、同步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夯实数智化发展底层技术保障、分类施策解决城乡融合动能不足困厄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共同富裕;要素双向流动;产业智能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6)08-0119-11

Role of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Unveil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idirectional factor flow and intelligen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QIU Guoliang^{1,2}, MO Ziqi¹

(1.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6, China;

2.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15,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s panel data from 1 172 counties in China spanning from 2010 to 2023 as the research sample. It treats the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delving deeply into the impact of these zones on common prosperi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can foster common prosperity. Mechanism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se zones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bidirectional factor flow and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Heterogeneity tests reveal that the promotional effect of the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n common prosperity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reas with low fiscal pressure, and regions with high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trengthening the fulcrum for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立德树人的重要论述研究”(23YJA710032)。

作者简介:邱国良(1978—),男,湖南平江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共同富裕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通信作者:莫梓淇。

business value—added and extend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simultaneously promote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factor markets, solidifying the underlyi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implementing targeted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insufficient momentum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se suggestions aim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national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ilot zone; common prosperity; bidirectional factor flow; industrial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完成发展生产力与消除两极分化重要目标的核心要义^[1]。面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要时刻,我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缩小居民收入与实际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迈向高质量发展夯实基本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立足民族复兴伟业关键时期,我国亟须推动全体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双重富裕,形成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有机统一,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劲驱动力。

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将城乡关系置于重点关注层面^[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大决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19 年 12 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旨在明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与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自此,我国通过充分落实城乡融合发展重要战略,于 2024 年将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成功缩小至 2.34^①,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6.16%^②。由此看来,大力贯彻落实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对于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水平进一步提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展开来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及促进产业协同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稳步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3]。与此同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有助于构建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缓解传统城乡关系中劳动力、土地与资本要素向城市聚集的局面,实现要素双向流动,进而协助农村突破要素流失瓶颈,推动共同富裕。同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还可通过推进智能化数字改造、提升数字化素养等方式为农村产业智能化提供创新活力,进而实现生产效率提高、人工成本降低及资源配置优化等产业优势,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基础。立足上述逻辑机理论述,本文采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作为外生性因素,构建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讨论二者之间的影响效应,为相关政策优化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经验支撑。

一、文献综述

纵观学界已有文献,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议题在国内外均受到广泛关注。国外学者虽然未明确述及“城乡融合”这一概念,但 Lewis^[4]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Friedmann^[5]提出的“核心—边缘”理论框架均为后期城乡关系演进提供关键启发。在此基础上,中国在总结全球城乡发展规律与本国特色城乡关系发展特征的基础上,作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性布局。国内已有大量研究针对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民、农业与农村发展的作用展开广泛讨论。第一,针对农民增收而言,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文化相耦合,打造农家乐、特色小镇等产业,推动服务业与农村产业深度融合,促使传统农村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为农民增收提供先决条件^[6]。第二,针对提高农业产业韧性而言,城乡融合发展为传统农业产业进行科学技术

① 资料来源: https://www.nmg.gov.cn/zfbgt/xyj/xyj1/202502/t20250218_2668286.html。

② 资料来源: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41209/b7560eec88e440c2a90114c3e2d667a7/c.html>。

赋能,通过种业革命、数字农业平台建设等技术,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监控,规避干旱、洪涝、病虫害等潜在风险,进而巩固农业产业稳定性,提高农业产业韧性^[7]。第三,针对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而言,城乡融合发展可通过优化农业空间布局、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等方式促进要素配置优化,大幅提高农村地区生产效率,进而提高农民整体收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问题^[8]。

梳理国内外共同富裕相关研究发现,国外研究虽未直接提出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 Phillips^[9]提出的共享繁荣理论框架和 Meier^[10]提出的发展与共享相关论述均与共同富裕的内核契合。进一步梳理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发现,弥合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从国内研究来看,朱玉龙等^[11]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分析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发现前述政策实施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继而实现共同富裕。吴贤荣等^[12]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对共同富裕发挥积极赋能作用。另外,鲍海君等^[13]基于浙江省县域的特定视角,研究发现城乡融合发展对发挥长效赋能机制。

学术界已初步验证了城乡融合发展对“三农”领域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恰为夯实“三农”发展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本文验证城乡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因果效应提供学理范式参考与实践指引。与此同时,相关文献指出弥合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因素,进一步为研究搭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与共同富裕的逻辑框架夯实基础。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三个方面的增量贡献。第一,现有研究局限于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民、农业与农村单一维度的探讨,虽有少量研究关注到城乡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政策效应,但仅结合局部浙江试点地区进行分析,缺乏对政策效应共性的深入探析。本文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共同富裕效应,并将共同富裕拆解为总量

增长(富裕水平)和全民共享(共同水平)维度,深度挖掘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冲击对于“破除公平和效率对立”的固有局限、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价值,明晰共同富裕推进路径。第二,在农业领域智能技术全域渗透、城乡边界消融的发展趋势下,当前研究对要素双向流动与产业智能化转型作用机制的关注不足,仅停留于探究产业布局优化、生产效率提升等传统发展范式。本文基于“要素—产业”协同演化视角,从要素双向流动与产业智能化转型的视角,研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为提高共同富裕水平提供全新思路指引。第三,围绕地理区位、财政压力及创业活跃度三重维度,系统性揭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异质性影响,为分类施策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现实镜鉴。

二、理论分析

(一)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与共同富裕

伴随“十四五”规划进入收官阶段,我国即将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此背景下,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通路之一,已成为我国人民的共同期盼^[14]。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共同”与“富裕”之间的关系。其中,“共同”代表着生产关系先进;“富裕”代表着生产力水平卓越^[15]。因此,本文从“共同”和“富裕”层面分析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影响。从“共同”层面来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落实可充分贯彻“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重要举措,形成城乡协同发展势态,以财政转移支付、农业补贴、工业技术下乡等实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助力。从“富裕”层面来看,一方面,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可极大程度上发挥城市与乡村自身特色产业的优势,并推动产业融合。该政策可推动城市周边地区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城乡融合产业发展,将物流、仓储、加工及生产等要素集聚整合,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带动城乡双向经济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国家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有助于提高城乡交通与通信网络一体化建设水平,促进医疗、教育、科技、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流动,实现基础设施延伸与公共服务普及,为乡村居民创造丰富的精神生活与精神财富,推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高度协调统一,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1:

H1: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可促进共同富裕。

(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要素双向流动与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大部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由农村流向城市,造成农村面临资源紧张的困境,置换共同富裕推动进程^[16]。此形势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可通过要素双向流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形成生产要素流动良性循环生态,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17]。其一,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通过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不同户籍之间存在的公共服务差距,构建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平台,破解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等局面,实现劳动力要素双向流动^[18]。其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有助于城乡间土地交易平台搭建,保障土地交易全过程公平、公正、透明,探索反租倒包、委托经营、土地股份合作社等新型土地流转模式,实现土地要素双向流动^[19]。其三,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通过挖掘农村产业区域性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拓宽产业发展前景,吸引城市资本下乡,实现资本要素双向流动。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可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形成要素流动活化的新发展模式,进而缓解城乡劳动力技能不匹配问题、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为迈向共同富裕提供强大合力。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2:

H2: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通过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共同富裕。

(三)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产业智能化转型与共同富裕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为产业智能化

转型提供前置条件,进而推动共同富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产业智能化转型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通过引入 5G、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搭建农业数字化管理系统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破除城乡间数字技术壁垒,利用智能化改造方式打通“生产端—销售端—农旅端”链路,实现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20]。二是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通过政策引导,吸引高等院校毕业生、科技人员、返乡农民工等技术创新人才回流,为农村数智运维团队建设提供充足人才支撑,形成数智化管理模式,进而实现产业智能化转型^[21]。从产业智能化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的层面来看,产业智能化转型通过智能制造与精准农业实现自动化生产,在降低能耗与人工成本的同时提高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为生产力变革提供新动能,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先决条件^[22]。除此之外,产业智能化转型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大量高附加值岗位,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提高。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假设 3:

H3: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通过产业智能化转型促进共同富裕。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1. 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国家城乡融合是否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本文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因果关系。基准回归模型为:

$$CP_{it} = \beta_0 + \beta_1 IURD_{it} + \sum \beta_n X_{it} + \sigma_i + \psi_t + \omega_{it} \quad (1)$$

模型(1)中, β_0 表示常数项; β_1 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系数,反映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效应。若该系数为正说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若该系数为负说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共同

富裕水平 (CP) 为被解释变量; i 、 t 分别表示县域与年份;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 ($IURD$) 为核心解释变量。 X 为相关控制变量; β_n 为控制变量的待估系数; σ_i 为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县域层面的固定特征或趋势; ψ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不同年份间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时间因素; ω_{it} 为随机误差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为验证要素双向流动与产业智能化转型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本文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为:

$$M_{it} = \alpha_0 + \alpha_1 IURD_{it} + \sum \alpha_n X_{it} + \sigma_i + \psi_t + \omega_{it} \quad (2)$$

$$CP_{it} = \alpha_0 + \alpha_1 IURD_{it} + \alpha_2 M_{it} + \sum \alpha_n X_{it} + \sigma_i + \psi_t + \omega_{it} \quad (3)$$

模型(2)与模型(3)中, M 为机制变量, 涵盖要素双向流动与产业智能化转型, 其余变量同模型(1)。

(二)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共同富裕 (CP)。共同富裕作为“共同”与“富裕”的有机统一, 是全体人民对于财富占有方式与占有程度的有机统一^[23]。因此,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24-25], 深刻把握共同富裕基本内涵, 构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并通过熵值法量化得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见表1)。

表1 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测度	单位	属性
富裕水平	全员劳动生产率	GDP/年平均从业人员数量	万元/人	正向
	农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正向
	居民生活水平	人均消费支出	万元/人	正向
		人均机动车保有量	辆/人	正向
		每百户年末计算机拥有量	台/百户	正向
共同水平	收入占比	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	%	正向
	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者报酬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	正向
	医疗健康水平	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	人	正向
	教育支出强度	教育支出总额/GDP	%	正向
	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城乡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量之差	个	负向
		城乡每千人拥有学校数量之差	所	负向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之差	万元	负向
	居民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	—	负向

2 自变量: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 ($IURD$)。本文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小

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十八部门公布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名单^③构建政策虚拟变量, 将政策颁布前 $IURD$ 赋值为0, 反之赋值为1。

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26-27], 将以下控制变量纳入考察, 探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作用。人力资本水平 (LCH) 是指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 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 对外开放度 ($DWKF$) 是指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 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政府干预程度 (DGI) 是指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对地方经济进行调节的程度, 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外商投资水平 ($DCLE$) 是指外国企业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进行投资活动, 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进行衡量。

4. 机制变量: 要素双向流动 (BFE) 与产业智能化转型 (IIT)。其一, 要素双向流动。要素双向流动是指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自由流动, 其中劳动力双向流动通过常住人口数量与户籍人口数量之比表示; 土地双向流动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成交面积表示; 资本要素双向流动通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城镇投资比重表示^[28]。基于上述指标, 使用加权平均法综合测度要素双向流动水平。其二, 产业智能化转型。产业智能化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 进而实现效率提高与产业升级, 以农业无人机年作业量的自然对数表示^[29]。

(三)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10—2023年中国117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探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CSMAR数据库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官方网站, 针对少量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在实证检验前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③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11个): 浙江嘉湖片区、福建福州东部片区、广东广清接合片区、江苏宁锡常接合片区、山东济青局部片区、河南许昌、江西鹰潭、四川成都西部片区、重庆西部片区、陕西西咸接合片区、吉林长吉接合片区。

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CP	共同富裕	16 408	0.331	0.196
IURD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	16 408	0.556	0.198
LCH	人力资本水平	16 408	9.045	0.175
DWKF	对外开放度	16 408	0.319	0.116
DGI	政府干预	16 408	0.277	0.057
DCLE	外商投资水平	16 408	0.193	0.184
BFE	要素双向流动	16 408	1.496	0.208
IIT	产业智能化转型	16 408	20.308	0.417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3 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基准回归结果。具体而言,列(1)表示未将控制变量纳入考量范围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结果,列(2)~列(5)表示逐步引入控制变量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可促进共同富裕,假设 H1 得证。原因可能在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实施有助于打破城乡分割现状,缓解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扭曲,进而根据自身优势产业发挥区域特色,实现城乡产业互促互补,为振兴特色农业与县域经济提供人才、技术等资源要素支持,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提高。

针对控制变量而言,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度、政府干预及外商投资水平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 5% 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各控制变量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可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等方式,提高劳动力市场中高学历人群占比,这为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提供驱动,助力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对外开放度提高有助于强化国内大循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吸引全球资源要素的同时打造我国竞争优势,提高我国资源要素质量与配置水平,为共同富裕提供国际市场支撑。政府干预可通过健全三次分

配制度、建立基本收入制度、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方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确保经济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与可持续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保障。外商投资水平提高有助于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升级,为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型提供资本与劳动力支持,同时扩大了就业规模,为劳动者提供更多收入保障,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CP	(2) CP	(3) CP	(4) CP	(5) CP
IURD	0.174 *** (3.209)	0.166 *** (3.519)	0.157 *** (3.675)	0.146 *** (3.823)	0.124 *** (3.561)
LCH	—	0.305 *** (3.582)	0.347 *** (3.369)	0.386 *** (3.645)	0.372 *** (3.451)
DWKF	—	—	0.821 ** (2.723)	0.794 ** (2.471)	0.705 ** (2.663)
DGI	—	—	—	0.871 *** (3.749)	0.629 *** (3.785)
DCLE	—	—	—	—	0.305 *** (4.253)
县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2.146 *** (4.033)	3.348 *** (3.825)	4.257 *** (3.679)	3.165 *** (4.133)	3.431 *** (4.046)
样本量	16 408	16 408	16 408	16 408	16 408
R ²	0.513	0.645	0.732	0.759	0.794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 $p < 0.10$ 时有统计学意义。括号中为 t 值。下同。

(二) 平行趋势检验

为保证通过双重差分模型验证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时,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构建的回归模型为:

$$CP_{it} = \gamma_0 + \sum_{k \geq -5}^4 \gamma_k IURD_{it}^k + \sum \gamma_n X_{it} + G_n \times t + \sigma_i + \psi_t + \omega_{it} \quad (4)$$

模型(2)中, γ 表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待估系数; k 表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的期数,具体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在政策实施前,干预组与对照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并未显现显著差异,大部分事前政策时点估计系数分布于零水平线上下波动,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实施后,政策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系数持续上升,呈现明显动态积累特征,有效印证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存在促进作用,即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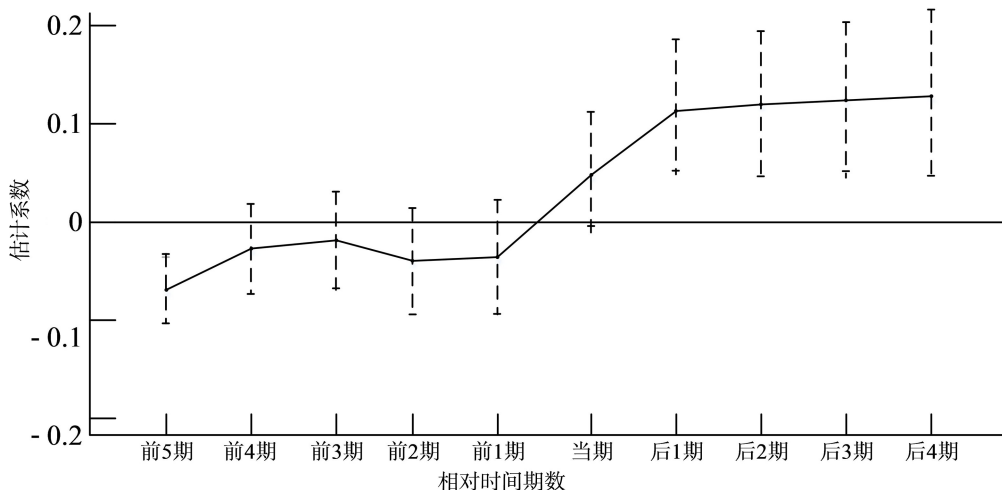


图1 共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检验

(三)安慰剂检验

为避免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其他因素影响,本文通过随机抽取县域样本作为实施政策的处理组,设置其他县级行政区为对照组进行安慰剂检验,重新对其进行回归并得到虚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削弱系统性偏差的影响,本文将上述过程重复1 000次,并绘制核密度分布图,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经过随机处理后得到的回归系数符合正态分布,且研究所得估计系数显著偏离于真实政策变量的系数估计值0.124,说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可排除潜在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说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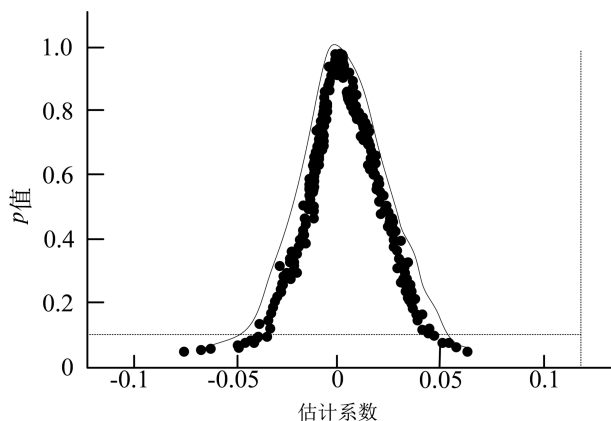


图2 安慰剂检验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

为增强基准回归结果稳健性,将共同富裕的测度方式由熵值法替换为主成分分析法与AHP层次分析法,借助不同赋权逻辑重新测度共同富裕水平,并将相关数据代入基准回归计量模型再度进行拟合。表4列(1)~列(2)结果显示,替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后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高可信度。

2. PSM—DID法

由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是基于自然场景与外生政策干预而设计的准自然实验,为避免样本内部没有充分满足随机性原则导致选择性偏差,本文采用PSM—DID模型对样本进行处理。具体操作为:将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度、政府干预及外商投资水平作为匹配变量,使用1:1临近匹配法剔除与匹配变量要求不相符的样本,匹配结果如表4列(3)所示。由表4可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验证研究结论稳健。

3. 缩尾处理

考虑到中国不同县域之间经济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距,导致样本中极端数据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缩尾处理^[30]。具体操作为:将模型涉及的微观层面连续变量在1%和99%百分位上进行极端值剔除,进而代入基准回归模型重新回归,所得结果如表4列

(4)所示。由表 4 可知,缩尾处理后的估计系数为 0.153,且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可促进共同富裕,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4. 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考虑到同期批复的与农村发展相关的其他政策可能干扰研究实证结果,纳入以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为代表的同期政策考量^[31]。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可优化农村与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延伸农村居民非农就业领域,增加居民收入来源,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可促进农村产业质态与规模快速升级扩张,推动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化转型,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增加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弥合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共同富裕进程。根据试点政策批复时间与地区,构建政策冲击变量 *UR* 与 *Eco*, 相关回归结果见表 4 列(5)~列(6)。检验结果显示,在排除同期政策干扰的情况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依然成立。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i>CP(new)</i>	(2) <i>CP(new)</i>	(3) <i>CP</i>	(4) <i>CP</i>	(5) <i>CP</i>	(6) <i>CP</i>
<i>IURD</i>	0.161 *** (3.458)	0.131 *** (3.815)	—	0.153 *** (3.916)	0.115 *** (4.463)	0.142 *** (4.589)
<i>PSM-DID</i>	—	—	0.139 *** (4.013)	—	—	—
<i>UR</i>	—	—	—	—	0.088 * (1.731)	—
<i>Eco</i>	—	—	—	—	—	0.064 (0.9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2.185 *** (3.694)	3.468 *** (3.852)	3.306 *** (3.439)	4.308 *** (4.421)	3.275 *** (4.431)	3.509 *** (5.027)
样本量	16 408	16 408	16 408	16 408	16 408	16 408
<i>R</i> ²	0.637	0.678	0.662	0.685	0.694	0.662

五、机制分析与异质性讨论

(一) 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所得结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列(1)与列(2)可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要素双向流动、要素双向流动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241 与 0.217,且均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可通过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共同富裕,假设 H2

得证。究其原因,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通过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修订土地管理法规、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等方式,打破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体制机制壁垒,为要素双向流动提供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农村资源要素持续富集,通过高技术人才返乡创业、健全城乡资金流动机制、建立城乡技术信息共享平台等方式,为发展新型农业形态注入活力,进而形成产业协同效应,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由表 5 列(3)与列(4)可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产业智能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与产业智能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系数均在 1% 置信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可通过产业智能化转型促进共同富裕,假设 H3 得证。其原因可能在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可通过建设城乡产业数字化平台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农产品全过程可视化溯源,构建数智化产业园区推广模式,实现产业智能化。与此同时,产业智能化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通过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系统等技术赋能产业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产业智能化还为新业态、新模式提供创新活力,催生出新兴岗位、扩大就业市场容量,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稳定性,进而推动共同富裕。

表 5 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1) <i>BFE</i>	(2) <i>CP</i>	(3) <i>IIT</i>	(4) <i>CP</i>
<i>IURD</i>	0.241 *** (4.509)	0.072 *** (3.621)	0.195 *** (4.035)	0.098 *** (4.238)
<i>BFE</i>	—	0.217 *** (3.309)	—	—
<i>IIT</i>	—	—	—	0.134 *** (3.6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3.196 *** (4.455)	3.345 *** (4.106)	2.961 *** (3.732)	3.247 *** (3.498)
样本量	16 408	16 408	16 408	16 408
<i>R</i> ²	0.669	0.646	0.668	0.613

(二) 异质性讨论

1. 地理区位异质性

由于不同地理区位所具备的要素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会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

影响。本文基于“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的划分方案,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进行地理区位异质性检验,所得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东部、中部地区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15与0.106,且均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西部、东北地区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92与0.014,且仅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较于西部与东北地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与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相较于西部、东北地区,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完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产业体系更健全,能够极大程度上吸引高学历人才驻留创业。高学历人才为地方传统产业带来先进的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兴产业涌现,为地方产业振兴提供充沛推动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高。反观西部与东北地区,多数地区以传统种养和初级资源加工产业为主,存在产业链条长度不足、产业基础薄弱、农村地区要素单向流出现象凸显等困滞,引致城市地区产业链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半径相对有限,引致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政策效应难以充分显现,故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相对不足。

表6 异质性检验结果(1)

变量	(1) 东部	(2) 中部	(3) 西部	(4) 东北
<i>IURD</i>	0.115 *** (3.462)	0.106 *** (3.985)	0.092 * (1.709)	0.014 * (1.7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3.952 *** (3.454)	3.507 *** (3.249)	4.092 *** (3.589)	4.151 *** (3.624)
样本量	7 378	3 598	4 592	840
<i>R</i> ²	0.621	0.657	0.693	0.665

2. 财政压力异质性

考虑到财政压力不同的地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本文借鉴学界已有研究^[32],以一般公共预算的预算结余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表示财政压力,该数值越高表示压力越大,并以该数值的均值为界限将财政压力划分高、低两个水平进行异质性检验,所得结果如表7列(1)和列(2)所示。由表7可知,高财政压力地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系数在5%置信水平上正向显著。低财政压力地区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系数在1%置信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相较于高财政压力地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低财政压力地区更为显著。究其根本,低财政压力地区经济发展基础牢固,拥有较多资源用于公共服务建设,可充分利用财政支出提高地区居民精神生活水平。除此之外,低财政压力地区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较大调整空间,从而便于应对外部经济波动,增强区域经济稳定性,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反观高财政压力地区,在产业基础薄弱、税源相对不足的影响下,地方财政自给率相对较低,难以覆盖城乡融合配套项目投资需求,引致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效难以充分显现,故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助力作用相对不足。

3. 创业活跃度异质性

考虑到创业活跃度不同的地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不同,本文将新注册企业数量作为衡量标准,以各地区新注册企业数量的均值为界限,将创业活跃度划分为高、低两个区间进行异质性检验,所得结果如表7列(3)和列(4)所示。由表7可知,高创业活跃度地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低创业活跃度地区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较于低创业活跃度的地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高创业活跃度地区更为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高创业活跃度地区通过催生大量新兴产业,扩大劳动力市场就业岗位,解决地区居民就业问题的同时改善民生,为实

表7 异质性检验结果(2)

变量	(1) 高财政压力地区	(2) 低财政压力地区	(3) 高创业活跃度地区	(4) 低创业活跃度地区
<i>IURD</i>	0.073 ** (4.136)	0.118 *** (4.529)	0.109 *** (3.274)	0.084 ** (2.4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3.434 *** (3.658)	3.621 *** (3.472)	2.948 *** (3.315)	3.004 *** (3.596)
样本量	7 728	8 680	8 442	7 966
<i>R</i> ²	0.731	0.759	0.702	0.713

现共同富裕提供正向驱动作用。低创业活跃度地区市场经营主体相对较少,存在要素闲置、资源单向流出等问题,滞缓城乡产业收益分配均等化进程,故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的吸收效应有限,稀释其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

六、结论与对策

(一) 研究结论

当前研究仅局限于探讨城乡融合对农业、农村、农民等局部微观视角下的影响效应,揭示城乡融合政策作用于宏观层面共同富裕的学术探究相对不足。立足城乡要素流动失序、空间格局分布失调、产业深度协同不足等困厄,本文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为制度研究对象,基于 2010—2023 年 1 172 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提出并验证“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与共同富裕”理论框架合理性。研究发现:①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可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结论证实了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与实现要素双向流动的目标下,施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在实现城乡系统动态平衡、弥合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层面具有一定解释力;②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能够通过要素双向流动与产业智能化转型双重途径,促进共同富裕;③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与中部地区、低财政压力地区及高创业活跃度地区效果更佳,为进一步搭建地方与中央弹性配合的政策实施体系提供参考。

(二) 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业态增值和农业产业链条延伸支点,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强化新业态聚能增值效应,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以数农融合吸引主流电商平台、国有企业在农村地区进行产业布局,实现城乡横向协作与业态融合,放大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效应。另一方面,应建设集结标准原料基地、集约加工转化、产业链路服务于一体的农村地区产业集群,驱动农业由原料输出向加工增值领域延伸转型,提升农村地区对城市产业和资源转移的承接能力,强化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效能,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同步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加快促

成要素双向流动。首先,各地需深度落实户籍制度改革,简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户手续,同时优化户籍管理政务服务平台,提高户籍迁移便利度,为促进人力要素流动提供前置条件,借助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共同富裕。其次,应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同时,搭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交易平台,优化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统筹配置和协同供应机制,实现城乡地区之间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最后,各地应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通过 PPP 模式参与农村地区产业发展项目投资,借助银保互动的方式完善涉农贷款风险分摊与补偿机制,强化城乡地区资本要素自由流动,进一步形成多要素驱动合力,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第三,夯实数智化发展底层技术保障,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其一,各地应引入智能农事管控技术,实现农田信息的实时感知、模型化分析与远程自动调控,充分发挥遥感设备定点检测技术优势,实现农业生产全场景覆盖,精准提取并判断农作物生长状态,实现产业智能化转型。其二,应适度加大农业智能装备、农机导航自动驾驶系统、农业智能机器人应用补贴力度,将高端智能农机产品纳入购置补贴目录,降低农业智能化转型成本。其三,优化涉农数据共享平台,加快推进 5G 基站向农村地区延伸,统一数据规范与接口标准,建立农业数据权属和使用规范,促进产业智能化转型,强化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

第四,分类施策解决城乡融合动能不足困厄,夯实共同富裕根基。对于西部、东北地区而言,应借助特色农牧、生态文旅、中药材等资源延伸本土特色产业链条,强化产业发展基础,着重对偏远乡镇落实基础设施集约共建项目,部署高密度城乡物流网点与交通运输网络,增强城乡融合发展动能,加快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对于高财政压力地区而言,各地应将涉农专项资金统一交由管理委员会统筹调配,盘活存量财政资金,避免非刚性行政投入碎片化与重复化。同时,应开发上级转移支付、专项债以及社会资本的多元组合筹资形式,弱化地区财政收支不抵支对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实施效能的影响,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对于低

创业活跃度地区而言,应搭建创业服务平台,全域推行创业主体项目审批简化流程,放宽经营场所与小微企业登记限制,降低创业试错成本,扩大小额创业贷款风险补偿池,激发创业活跃度,增加经济增长动能,促进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杨晨. 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基于数字技术赋能的路径[J]. 中国软科学,2025(增刊1):427-432.
- [2]孙玉环,张冬雪,梁雨菽,等.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2024,41(2):87-99.
- [3]李靖,张晖,韩青. 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农民增收的路径与效应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10.
- [4]LEWIS A W.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22(2):139-191.
- [5]FRIEDMANN J, Douglass M. Agropolitan development: towards a new Strategy for Regional Planning in Asia[M]// Growth Pole Strateg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sian Experience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8:163-192.
- [6]翟郡,黄钊溟,谢泳欣,等. 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民增收:基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25(3):79-95.
- [7]李宏,唐新. 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韧性的多维测度与影响机制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25(6):66-81.
- [8]罗鉴,游龙. 城乡融合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效应检验[J]. 统计与决策,2024,40(21):53-58.
- [9]PHILLIPS F. Toward an intellectual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hared prosperity"[J]. 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 research, 2005, 18:547-568.
- [10]MEIER G M.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M].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1:61-87.
- [11]朱玉龙,冯淑怡,王博,等. 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政策实施的共同富裕效应:基于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2026(1):115-136.
- [12]吴贤荣,李正楠,张俊飏. 农村信贷和农业保险对县域共同富裕的协同效应: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视角[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72-83.
- [13]鲍海君,孙一诺. 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系统演化视角下的浙江省县域实证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2025(10):1-7.
- [14]樊增增,邹薇. 从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相对贫困的动态识别与贫困变化的量化解构[J]. 中国工业经济,2021(10):59-77.
- [15]万海远,陈基平.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J]. 财贸经济,2021,42(12):18-33.
- [16]王向阳,申学锋,康玺. 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的实证分析与创新路径:基于以资本要素为核心的视角[J]. 财政科学,2022(3):34-48.
- [17]李修远. 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战略重点与实践进路[J]. 科学管理研究,2026,44(1):2-13.
- [18]孔祥智,谢东东. 缩小差距、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1):12-22.
- [19]熊子怡,张科,何宜庆.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的实证分析[J]. 世界农业,2022(10):111-123.
- [20]龙海明,程谟怡,刘子欣. 智能化发展能否促进绿色消费:基于城乡融合建设的中介效应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3,44(6):85-93.
- [21]谭玉松,孙欢.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共同富裕: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J]. 经济问题,2024(10):59-67.
- [22]赵伟,李香英,赵晶. 中国智慧农业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区域差异与收敛性分析[J]. 科学管理研究,2026,44(2):146-155.
- [23]林嵩,谷承应,斯晓夫,等. 县域创业活动、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23,58(3):40-58.
- [24]郭辉辉. 高质量就业与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影响[J]. 中国软科学,2025(S1):80-87.
- [25]覃成林,杨霞. 先富地区带动了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吗:基于空间外溢效应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17(10):44-61.
- [26]韩亮亮,彭伊,孟庆娜.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软科学,2023,37(3):18-24.
- [27]王永进,刘玉莹. 在智能化和城镇化中走向共同富裕[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10):5-25.
- [28]王红霞. 要素流动、空间集聚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定量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上海经济研究,2011(12):45-55,63.
- [29]陈东,秦子洋. 人工智能与包容性增长:来自全球工业机器人使用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22,57(4):85-102.
- [30]万广华,江葳蕤,陈亚会. 中国农村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与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2022(11):57-69.
- [31]于红,胡兴波,于欣言. 政策工具视角下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政策文本研究[J]. 创新科技,2025,25(2):16-27.
- [32]佟大建,许蕾,张锦华. 城乡融合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J]. 上海经济研究,2025(7):37-50.